

胡昭曦
著

旭水斋存稿

XuShuiZhai
CunGao Xuji

续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胡昭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庆梅
责任校对:陈月霖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旭水斋存稿续集 / 胡昭曦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690-0335-2
I. ①旭… II. ①胡…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文集
②巴蜀文化—文集 IV. ①K244.07-53②K872.71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6968 号

书名 旭水斋存稿续集

著 者 胡昭曦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0335-2
印 刷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240 mm
印 张 23.5
字 数 36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1)
蒙文通先生国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祝贺《蒙文通全集》出版.....	(3)
四川省省名考析.....	(30)
宋代蜀学研究新识.....	(43)
南宋二江诸儒与南轩之学返传回蜀.....	(47)
宋代蜀学转型的再探讨.....	(66)
大足宝顶石窟的凿建与宋蒙（元）战争.....	(79)
为世界闻名的古战场晚宋钓鱼城修史.....	(91)
宋元之际泸州迁治问题再议.....	(105)
街子古镇与宋代永康县.....	(118)
全面系统研究之力作：《荆公新学及其兴替》	(128)
质量精好的《宋代蜀文辑存校补》	(132)
加强蜀学研究，繁荣中华学术文化.....	(136) .
直探堂奥，慧见卓识	
——读蒙文通师《巴蜀史的问题》	(137)
蜀学与蜀学研究.....	(153)
从《说文月刊》	
辨析“巴蜀文化”命题的初义.....	(158)
“巴蜀文化”学术命题的地理含义	(167)

巴蜀文化研究与建设文化强省	(180)
一通罕见的晚清书院碑石	
——新出土《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初探	(189)
《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	
最初竖立地再探	(200)
华西协合大学与巴蜀文化研究	(206)
天府新区建设与《华阳国志》	(223)
望江楼公园几座古建筑的历史变迁	
——辑补彭芸荪先生《望江楼志》	(231)
新花再放结硕果，改革发展耀志书	
——读2013年版《自贡市贡井区志（1986—2005）》	(246)
历史的图证，深沉的乡情	
——《富顺背影——世纪老照片·序》	(252)
深入发掘资料，推进蜀学研究	
——文守仁先生《蜀风集》读后	(255)
加强领导，保证合力，坚持质量	
——对编纂《巴蜀全书》的希望	(265)
汇报·感恩·鞭策	(268)
在学校赠书会上的感言	(270)
在母校的襁褓中成长	
——回忆旭川中学第一个团支部	(273)
旭川中学与旭川书院（资料汇编）	(280)
建议大力彰显“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产于成都”	(289)
关于公示确定“四川大学校歌”的浅见	(292)
“国学与现代化”议	(297)
“大足学”研讨	(300)
关于“三苏祠”规划的看法	(303)
《成都精览》：一部记述成都历史精要之书	(306)

谈都江堰市文庙的灾后重建.....	(308)
持续深入推进巴蜀古城堡考察研究.....	(312)
推荐出版《宋会要辑稿》整理本.....	(314)
祝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出版.....	(316)
《国学》集刊：推进国学研究的新园地	(318)

【附录一】

教书育人重能力，科学研究尚创新

——著名宋史专家胡昭曦教授访谈录

●胡昭曦■粟品孝.....	(321)
胡昭曦：习学人生，不断攀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吴运亮、曾江.....	(346)
胡昭曦：蜀学的渊笃与健雄	
《成都日报》记者 蒋蓝.....	(349)

【附录二】

胡昭曦学术著作目录（1961—2016）..... (356)

后记..... (369)



综合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我国素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传统。宋人王质指出：“世传，杜诗不读万卷书、不行一万里不可以观。”明人陈第说：“读万卷书，不行万里道，不足以知山川。”清人潘天成概括道：“大丈夫不读万卷书不走万里路，安能作好文章明圣贤之道乎！”这一传统对于做学问来说，就是讲究综合研究。近世又有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的运用，这些也都是讲综合研究的方法。把综合研究这种方法运用到史学中，就是要求史学家将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社会调查和实地考察等相结合，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走出书斋拓展视野、扩充资料，进行多学科多方位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用多种证据弄清历史的真面目。综合研究方法，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研究历史，首先得阅读历史文献，这是必要前提。我国存有长时期连绵不断、浩瀚丰富的官私文献，这是进行历史研究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阅读了并不意味着就读懂了。要读懂有关历史文献，需要了解作者的写作过程，并尽可能多方验证，包括到实地去考察。在研究晚宋历史和宋代四川历史时，笔者在阅读历史文献后经常会产生一些问题，于是就带着这些问题到四川省内 50 多个县、市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实地考察才算真正读懂了文献。比如，为了弄清宋与蒙古（元）在四川的长期战争，考察了现存山城遗址 15 座、水碛 2 处、铁锁关 1 处，对地理形势、攻防设施、战法战场、交通路线等有了更形象的了解，认识到文献记载之实，也获得了文献上得不到的资料，还搜集到一批珍贵文物。再具体下去，比如四川东面的夔门险关是如何

被攻破的？把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就能明白原来攻蜀者是以水军主力驻瞿塘峡东口，另派小部队暗中攀缘江岸山道向西，再顺江而东，上下流夹击，守军就被瓦解了。又如，被称为“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的新津五津渡，到实地察看后才弄清其成为历代军事要冲的地理形势。

“尽信书，不如无书。”对历史研究来说也是如此。受作者认知水平的局限或者由于传抄刊印的失误，历史文献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应对其进行校勘、考订等工作，如果再以考古成果、社会调查、实地考察等与之互校互证互补，将会大大减少其局限和失误。比如，宋初青城县在什么地方？自明代《续资治通鉴纲目》以后，历史文献记为眉州青神县。但经我们多次实地考察，认为应是永康军属县，治所在今都江堰市徐渡乡境内。宋代著名理学家、蜀学大儒魏了翁创办的蒲江鹤山书院在当时非常著名。该书院原址在什么地方？地方志称，在距蒲江县城一里的山顶上。但是，结合各种资料进行调查，我们认为应在蒲江县城东约十里的隈支山（今名玉芝山）上。此外，有的资料是历史文献上未见记载或记载欠周详的，只能从考古资料上得到订补，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

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于资料，论证问题需要大量多方面的可信资料。只有运用综合研究这种基本方法，才能使文献与实际相结合、史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达到认识历史真相的目的，使之成为信史。同时，运用综合研究这种基本方法，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难题经常还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顿悟，从而将历史研究推进到更为深入的境地。

（载《人民日报》2015年5月4日学术版“大家手笔”栏；《大家手笔》，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版）



蒙文通先生国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祝贺《蒙文通全集》出版^①

蒙文通先生是四川大学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学者誉称蒙文通先生为国学大师，如：“二十世纪中国卓尔不群的国学大师、国史专家。”^②“20世纪少有的国学大师之一。”^③“20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儒学大师、国史专家。”^④“我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⑤“精通经学和佛学的国学大师。”^⑥

对“国学”概念的界定，学界至今尚无一致看法，本文所谓“国学”，是指在近代与号为“西学”“新学”等欧美学术文化相对的中国学术文化，即我国自远古至近代的传统学术文化，重点包括儒、孔子、道、佛、文、史、诗赋、艺术等。国学是今日我国文化之本根，

① 在这篇文稿中，参阅了一些学者的有关著述，引用了其中的研究成果（均予注出），谨此一并致谢！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师兄蒙默教授（已于2015年12月逝世）的支持，他于逝世前（9月）将新出版的《蒙文通全集》赠笔者学习和撰稿之据，借此文稿祝贺《蒙文通全集》的出版，感谢师兄的长期帮助和指导，表达对师兄的深切怀念！

② 萧蓬父：《蒙文通与道家》，《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211页。

③ 《“通儒”蒙文通全集出版》，《成都日报》，2015年7月14日第6版。

④ 郑道：《道家文化的新世纪——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化报》，1996年9月15日。

⑤ 谢和平：《在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致词》，《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版，第1页；吴铭能、黄博：《贯通四部，圆融三教——蒙默先生谈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的学术思想》，载《经学研究论丛》第15辑，台湾学生书局，转引自王承军：《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54页。

⑥ 刘复生：《通观明变，百川竞发——读〈蒙文通文集〉兼论蒙文通先生的史学成就》，《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第120页。

是中华民族民族性之集中表现，是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蒙文通先生是在国学研究上做出卓越贡献的国学大师，笔者受先生教诲以来已届 60 年，最近又学习了 2015 年出版的《蒙文通全集》，拟就所学所知所感所受，对蒙文通先生的学术成就、师德与风采做些简略介述。

一、生平简介^①

蒙文通先生名尔达，字文通，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 年）九月十八日^②生于四川省盐亭县石牛庙乡一个儒学之家。1968 年 8 月 1 日逝世于成都市水井街 73 号四川大学教职工宿舍，享年 74 周岁。

蒙先生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教育，5 岁（以虚岁计，下同）入私塾，15 岁（1908 年）读四川高等学堂附属中学丙班，与周太玄、李劫人、魏时珍、王光祈、郭沫若、曾琦、张煦等同学。^③ 18 岁（1911）考入当时四川国学最高学府四川存古学堂^④（1912 年 6 月存古学堂改名国学馆与国学院合并为四川国学院，1914 年改名为四川国学学校，廖平任校长），成为廖平^⑤、刘师培^⑥、吴之英、谢无量等

^① 有关简介主要据蒙默：《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 6 册），巴蜀书社，2015 年版；龚谨述：《蒙文通先生传略》，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版；牛敬飞、张颖：《追忆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蒙默老师采访记》，《天健》，第 17 期（2005 年 2 月川大历史文化学院天健文史社编印，《文史杂志》2016 年第 2 期部分选载，题目有改动）；《年谱长编》，第 354 页。

^② 《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写道：“先生后在被询及年龄时，常以‘出生在甲午海战那年’，以示不忘国耻。”先生还以农历九月十八日的生日喻为“9.18 事变”日，亦示不忘国耻之意。载《蒙文通全集》第 6 册，第 237 页、第 247 页。

^③ 《年谱长编》，第 29 页。

^④ 1910 年，以保存国学为宗旨的存古学堂设立。1912 年，存古学堂改四川国学院。吴之英为院正，刘师培为院副，廖平等名师受聘。1914 年，又改国学学校，廖平任校长，宋育仁任教务长。国学院前后约五年，出了不少杰出人才，如蒙文通、向宗鲁、彭云生等。1918 年四川国学学校更名为“四川省立国学专门学校”。1928 年并入四川大学，为该校文学院。

^⑤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县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 年）进士，历任绥定府（治今达州）教授、尊经书院襄校等，1914 年，任四川国学学校校长。

^⑥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盦（庵），江苏仪征人，经学家。1912 年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1917 年，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大儒的弟子，可谓师承名门。1913年刘师培先生讲授《说文解字》，以“大徐本会意之字，段本据他本改为形声，试条考其得失”为题考试，对蒙先生三千余言考试答卷的评语写道：“首篇精熟许书，于段、徐得失融会贯通，区辨条例，既昭且明。案语简约，尤合著书之体。”^① 蒙先生受教廖平先生尤其久深。1923年廖平先生阅评蒙先生于上年刊出的《近二十年汉学之评议》一文时写道：“蒙文通文如桶底脱，佩服佩服，后来必成大家。”^② 蒙先生23岁（1916年）上半年之后，在乡自研经学，后于成渝等地教中学（省成联中——今石室中学^③、重庆联中^④、重庆市立第二师范学校^⑤等）。30岁（1923年）“南走吴越”，游学各地，曾与章太炎切磋经学，入支那内学院向欧阳竟无大师请教佛学。^⑥ 与汤用彤、王恩洋、钱穆等交往研讨学术。33岁（1926年）下半年在成都任教于成都佛学院（20世纪80年代峨眉山报国寺方丈普超法师即当时学生）。

34岁（1927年）下半年，受聘任国立成都大学教授。^⑦ 从20世

^① 载《蒙文通学记（增补本）》手迹图版；《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0页。

^② 载《蒙文通学记（增补本）》手迹图版；《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2页。“桶底脱”，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写道：“禅宗人常形容悟‘如桶底子脱’，桶底子脱，则桶中所有之物均一时脱出。得道的人于悟时，以前所有的各种问题均一时间解决。”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中册第667页。廖先生是称赞蒙文通思想敏锐、说理透彻、文字畅达、全篇贯通。

^③ 同时任教者有彭云生、吴虞等。参《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1页。

^④ 同时任教者有彭云生、唐迪风、恽代英等。参《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1页。唐君毅即当时学生，《唐君毅先生全集》第十九卷《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第752页写道：“忆吾年十三，始就读重庆联中。……第二年国文则蒙文通先生更为讲授宋明儒学之义。”台北学生书局，1986年版。

^⑤ 同时任教者有彭云生、唐迪风、萧楚女、张闻天、邓少琴等。参《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1~242页。

^⑥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江西宜黄人。近代著名佛学居士。1922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任院长。1937年后，内学院迁到四川江津，院名为支那内学院蜀院。1949年，改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停办。内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学学者，如梁漱溟、熊十力、吕澂、汤用彤等。1940年欧阳大师致蒙先生信中说：“唯我文通，始足与谈。”载《蒙文通学记（增补本）》手迹图版。

^⑦ 校长为张澜，同时受聘的有吴虞、吴芳吉、李劫人、刘咸炘、彭云生、唐迪风等。参《蒙文通先生学行简谱》，《蒙文通全集》第6册，第244页。

纪 20 年代起至 40 年代中，先后任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河南大学、北京大学（1933 年下半年至 1935 年上半年^①）、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四川大学（1937 起）、东北大学（三台，1940 年下半年）、华西协合大学（先兼金陵大学教授，1942 年改兼华西教授）等校教授，1947 年兼任尊经国专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大学教授，1952 年华西大学哲史系合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乃专任四川大学教授。1956 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

蒙文通先生还曾兼任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1941—1949）。四川省图书馆开馆于民国元年（1912 年），时名四川图书馆（至民国十六年，1927 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重建时名四川省立图书馆。1952 年命名为四川省图书馆。^② 1940 年在前清城守衙门重建开馆后，1941 年蒙文通先生受聘出任馆长（2 月到任），1949 年 4 月去职，计任职 8 年。^③ 他除主持日常馆务外，还设立研究辅导部，指导图书馆同仁开展古文献整理校勘，数年间整理竟达 20 余种；创办《图书集

① 当时，邓广铭先生是蒙先生所开宋史课的听课学生。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一章《中国宋史学的开创和奠基》将开此课的具体时间作“1933 至 1935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版，第 5 页）。之后，朱瑞熙先生在北京大学“纪念邓广铭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看到邓先生生平事迹展览的展品中，有邓先生 1932 年至 1936 年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期间的成绩单，以此确定蒙先生所开宋史课的具体时间是 1934 年 9 月至 1935 年 7 月（参见朱瑞熙：《中国最早开设宋史课的准确时间》，2007 年 8 月 7 日电子版文稿）；聂文华：《邓广铭宋史研究的学术渊源考——以蒙文通宋史课程的讲授为中心》，《史学月刊》，2015 年第 3 期。

② 19 世纪中叶，美国和英国开始设立公共图书馆。1900 年，傅崇矩在成都桂王桥北街创建图书局，宣统二年（1910 年），清廷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和各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筹备于宣统三年（1911 年），开馆服务于民国元年（1912 年），时名四川图书馆，设在成都少城公园一栋青砖小楼内，因楼前植松八十棵，又被称为八十松馆。民国十六年（1927 年）四川图书馆终因“省款支绌”，移交成都代管。次年，更名成都市立图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 年），四川图书馆在成都前清城守营衙门（后为中城小学）重建开馆，名四川省立图书馆。1952 年命名为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经过了上百年的建设和发展。

③ 《年谱长编》，第 161~162 页。



刊》杂志，登载国学研究文章，共出九期^①；建立了国际图书交换业务。1941年2月26日，四川省通志局奉令撤销，该局所有图书、文稿、物品由四川省立图书馆接管。^②期间，蒙先生采取措施，妥善地保存了宋育仁主修的《重修四川省志稿》，1942年新成立的四川通志局接收此志稿时，“三百二十三册，均完好无缺”。^③

笔者于1956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五年制）。本系有不少著名老师，其中尤以徐中舒、蒙文通、缪钺、冯汉骥等教授斐声学界，笔者经常获教，感到十分幸运。因蒙先生兼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而常住北京，尚未直面受教，直到三年级以后，才聆听到他的选修课和学术讲座。1961年8月毕业后，笔者被留系任教，系里确定蒙先生为笔者的指导老师，从此跟随先生重点学习宋史，并协助他在整理文稿、指导本科生论文方面做点工作。^④1965年下半年笔者被派参加农村“四清”工作，1966上半年返校时，先生早被打入“牛棚”，我们师生乃被隔绝，直到1968年8月蒙先生不幸逝世。在三年多时间里，笔者侍学先生，接触频繁，求教甚多。蒙先生对笔者关怀备至，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热情扶植，终生受用不尽。^⑤

^① 《中华图书馆协会报》1942年第5至6期合刊载文云：“四川省立图书馆……自蒙馆长兼任以来，对于学术研究更多贡献，最近该馆出《图书集刊》，足见对学术研究之提倡。”转引自《年谱长编》第172页。

^② 《年谱长编》，第165页。

^③ 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写道：“老师还有一件极大的功劳，是将宋芸子先生主修的《重修四川省志稿》全部妥善保存下来。……（通志局结束后）《志稿》由教育厅交省图书馆代管。当时日机天天轰炸，蒙老师特意送至新都桂湖由新都民教馆代为保存。一九四二年新成立四川通志馆，应接收宋《志稿》。蒙老师亲自到桂湖点交，我当时在通志馆任职，恭随老师前往交接。《志稿》共三百二十三册，均完好无缺。”载《盐亭文史资料选集》第10辑第63~64页，转引自《年谱长编》第175页。

^④ 例如，1961年12月笔者第一次为先生记录并整理学术会议发言稿《孔子思想中进步面的探讨》，先生将此稿加以审改一直保存下来，50年以后被蒙默教授收入《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第17~25页。又如，协助蒙先生进行指导数位本科生同学毕业论文的具体工作。

^⑤ 参见胡昭曦：《谆谆教导，受用终生——缅怀文通师》，四川联合大学（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编印《蒙文通教授诞辰百周年学术座谈会纪念册》，1994年10月（收入胡昭曦《巴蜀历史文化论集》，巴蜀书社，2002年出版）；胡昭曦：《言传身教，垂范后学——缅怀蒙文通师》，《四川大学报》，2004年11月17日第4版（收入胡昭曦《旭水斋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

60年来，先生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笑容可掬。坦荡豪爽，平易可亲。笔耕不辍，诲人不倦。言传身教，师者楷模。

二、学术成就

（一）著作丰硕

蒙先生很早就撰写发表学术论文。22岁（1915年）在四川国学学校就读时撰《孔氏古文说》，为廖平校长嘉赏，以之刻于《国学荟编》（相当于今学报）。30岁（1923年）在南京支那内学院访学时撰《中国禅学考》，深得欧阳竟无大师赞赏，即以刊于该院年刊《内学》。34岁（民国十六年，1927年）撰成《古史甄微》，这是先生成名之作。先生终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巴蜀书社自1987年起，开始编辑出版由蒙文通先生哲嗣蒙默教授（1926—2015）整理的《蒙文通文集》，至2001年（历时14年），将六册全部出齐，收录近百篇（部）著作，共约230多万字。

在巴蜀书社的邀约下，蒙默教授以耄耋之年，编成《蒙文通全集》，并于2015年5月出版。《全集》在《文集》的基础上增加了以前未能收录的手稿、诗词、期刊佚文、学术年谱等近百万字，其中不乏首次面世的内容，如书中的《甄微别集》所收则大多是新增篇目或者别稿，全书共182篇（部），计320万字。编为九卷，仍勒为六册。

（二）学术特点

蒙先生学问渊博，功力深厚，探源明变，抉原甄微，融会贯通，意新义奥，卓识慧见。要全面概括蒙先生的学术特色，这是笔者的学力达不到的，下面就笔者的认识列举一些凸显的特点。

1. 广博深邃的学术领域

先生的著述，大多已收入《蒙文通全集》。此外，还有一些手稿尚待整理。

第一册《儒学甄微》，含《儒学五论》《经学抉原》《性理学言》等。

第二册《诸子甄微》《史学甄微》。《诸子甄微》，含杨朱、黄老、墨、法、仙道、山海经、管子、禅学、唯识学等。《史学甄微》，含《中国史学史》等。

第三册《古史甄微》《古礼甄微》。《古史甄微》含《古史甄微》《北宋变法论稿》及古代社会经济等。《古礼甄微》，含古代社会制度政治制度、《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等。

第四册《古族甄微》《古地甄微》。《古族甄微》，含《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巴蜀史的问题》《庄蹻王滇辩》《越史丛考》《外蒙独立问题》、古代其他民族等。《古地甄微》，含《古地甄微》《成都二江考》，古地理、气候考，地方志研究等。

第五册《道教甄微》，含《道教史琐谈》等道教史研究及对前人有关《老子》《道德经》《庄子》《阴符发秘》等文献的辑校、重编、注疏等。

第六册《甄微别集》，含《治学杂语》、诗曲、旧稿辑存等。

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学术领域广博，研究范围深邃。学者评论：“先生一生出经入史，转益多师，形成了自己贯通经、史、诸子，旁及佛道二藏、宋明理学的学术风格，在思想史、史学史、先秦史、宋明史、古民族、古地理、道教文献整理等领域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被誉为‘通儒’。”^①

2. 意新识卓的学术见解

据笔者的浅薄认识，列举重要者于下：

(1) 经学、理学研究的新发展。

蒙先生的经学代表作是1930年发表的《经学抉原》^②和1944年发表的多年经学研究之集成的《儒学五论》^③。

有一种意见认为，廖平经学“标志着了‘经学时代’的结束”，

^① 《“通儒”蒙文通全集出版》，《成都日报》，2015年7月14日第6版。

^② 《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原载《史学杂志》1930年第2卷，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

或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廖平经学是否是经学时代或经学的终结，哲学史界尚在深入探讨。然而，蒙文通先生师承近代经学大师廖平先生，且加以衍绪发展，遂成为当代经学大家，这是事实。

经学原本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在汉代独尊儒术后，则特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西汉末年，经学研究中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派别。两派在学术上各有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视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注重阐发经文的“微言大义”，主张通经致用；以董仲舒、何休等为代表，最重《春秋公羊传》。古文经学崇奉周公，视孔子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偏重训诂，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较弱；以刘歆、贾逵等为代表，最重《周礼》。两派长期争论，到清末更有发展，以皮锡瑞、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与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

两汉家法在晚清已经混杂不明，多数学者遵循的仍然是“由小学入经学”，侧重于文字训诂而割裂了经学与政教体制的联系。廖平却能独辟蹊径，考镜源流，上溯西汉，从制度入手来研究经学。廖平首倡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他的经学是经学史上的又一高峰。廖平认为经学中最关键的在于制度，他说“六经旨要，以制度为大纲”，“予故以为经学之要，在制度不在名物”，他认为制度无所不包，只有推明制度，才能收到通经致用的效果。廖平主要从《王制》入手治经学。他用《王制》与《周礼》所载礼制的不同来推明今古之分的源流。阐发孔子素王托古改制的微言，也与他对《王制》的认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蒙先生深受廖先生“通经致用”学经目的的影响，推崇廖先生以礼制判分今古的治经方法，对汉代今文学家“素王”“革命”理论及其“一王大法”制度做了系统揭示和深入论评。学者认为蒙先生是在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阐发师说，加以发展，表彰廖氏《春秋》学，由廖平以今古讲两汉，进而以《春秋》论先秦，倡鲁、齐、晋之学，以地域分今、古；破弃今、古文经家法，而宗周秦儒学之旨。蒙先生著《古史甄微》意图重建上古国史，澄清经史关系，以史证经，申明



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①

作为廖平的学生，蒙先生不只是继承了廖平的学说，更重要的是进行了阐发、修订和发展，他的经学研究已与廖先生有明显不同，有学者认为主要是^②：

第一，从地域文化入手，区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差异。他说：“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为梁、赵之学也。……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③

第二，经学是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先生写道：“经学即是经学，本自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④这与“六经皆史”（章学诚）、史附于经、经附于史（周予同）、今文为哲学、古文为史学（廖季平）皆有不同。^⑤

第三，强调经学是“明道的学问”。他认为：“周秦诸子为国史上最为灿烂的思想文化，而经术者此灿烂文化之结晶也。”^⑥主张“现在讲经，是不能再守着两汉今古文那样讲，是要追向先秦去讲”^⑦。强调指出：“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能出其轨范。”^⑧明白地肯定经学在秦汉明清

① 张凯：《平议汉学：蒙文通重构近代“今文学”系谱的尝试》，《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4期；蔡方鹿：《蒙文通经学片论》，《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第122页。

② 本节所论参见刘复生：《转型而不同：晚清以来蜀中学人之经史观》，《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6期，第39~46页。

③ 《经学抉原·序》，《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经史抉原》，第235页。此序戊辰年（1928年）撰于成都国学院。

④ 《论经学遗稿·丙篇》，《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第310页。

⑤ 周予同先生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一书所作“序言”概括说：经学有三大流派，其特色，今文学家将孔子视为政治家，古文学家将孔子视为史学家，而宋学家将孔子视为哲学家。见《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⑥ 《论经学遗稿·丙篇》，《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第311页。

⑦ 《经学导言·绪论》，《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经学导言》，第196页。

⑧ 《论经学遗稿·丙篇》，《蒙文通全集》第1册《儒学甄微》，第310页。